

【聊斋之爱】

□马瑞芳

媲美牡丹亭的三世之恋

有学者以《红楼梦》宝黛爱情为“知己之爱”始作俑者,其实在曹雪芹出生那年驾鹤西去的蒲松龄,已借《连城》将“知己之恋”写得如泣如诉,如诗如画。

在聊斋爱情故事中,“色”乃至“性”占相当重要位置。但从美学层面看,以“色”、“性”为主要依据的爱情,与感情共鸣,相濡以沫的恋爱不可同日而语。令人庆幸的是,近代文明思想启动了艺术求新思维,蒲松龄写知己之爱的《连城》成为古代小说中写爱情的最佳篇章之一。王士祯感叹:没想到《牡丹亭》之后还能再出现这样的人物。

《牡丹亭》写杜丽娘和柳梦梅的三世情缘:第一世,杜丽娘梦遇柳梦梅,魂和魄相爱;第二世,杜丽娘死后,柳梦梅来到埋葬杜丽娘的花园,杜丽娘来相会,人和鬼相爱;第三世,柳梦梅发冢,杜丽娘复活,二人结婚,完成人世婚姻。

《连城》也写三世相爱,男主角尤出色。

古代小说中叱咤风云的英雄,建功立业的男儿,阳刚十足的帅哥,总是奔驰在疆场,无暇恋爱。三国英雄关羽,眼前有美女,眼珠子都不转过去;水浒英雄燕青,明明被李师师爱上,却推金山、倒玉柱,拜了个好姐姐。似乎爱情男主角只能是白面书生、奶油小生,甚至是腻腻歪歪的小男人。

“有肝胆”的男子汉如何恋爱?蒲松龄用乔生画影图形。

第一世:生以肉报的知己恋。

富家女连城知书达理,擅长刺绣,史孝廉为钓金龟婿拿她绣的“倦绣图”征求书生题咏。贫穷的乔生献上了诗:

慵鬟高髻绿婆娑,
早向兰窗绣碧荷,
刺到鸳鸯魂欲断,
暗停针线蹙双蛾。

乔生表达出对连城渴望爱情幸福的体味和共鸣。连城喜出望外,向父亲称赞。史孝廉对乔生“贫之”,连城却动心了,派老妈子送银子给乔生让他安心读书。乔生说“连城我知己也”,思念连城,如饥似渴。这时二人还不曾见面,这建立在“知己”基础上的爱,和传统小说中以貌取人的“一见倾心”有本质区别。

父母之命替金钱为虎作伥,史孝廉挑中盐商之子为婿。连城病得起不了床。给连城治病的西域头陀出个偏方:要青年男子心头肉做药引子。连城父亲把这要求通知“佳婿”。得到的回答是:“痴老汉,欲剜我心头肉也?”史孝廉宣布:“谁舍得割心头肉,我就把女儿嫁给他!”

乔生自带尖刀,到史家割下心头肉,交给西域头陀。连城病好了。在生死考验前溃不成军的“女婿”,却凭一纸婚书坚持对连城的占有,以“欲讼官”威胁史孝廉。史孝廉只好设宴款待乔生,拿一千两银子做报答。乔生回答:我之所以不爱惜心头肉,是报答知己,

我岂是卖肉的!拂然而去。

“生以肉报”,巧妙、好玩、有趣。乔生对连城“但得真知我,不谐何害”,爱得轰轰烈烈、坦坦荡荡!

第二世:女以魂报的鬼魂恋。

连城信守忠诚,在王家逼婚时病死。乔生前往吊唁,一痛而绝。一对聊斋儿女,为爱情可以去死。死是生命的结束,却是恋人间生生死死苦追寻的延续。乔生好友顾生在阴世任职,为连城争得随乔生复活的机会。连城和乔生这对恋人像火中凤凰获得新生,返回阳世前,一般小说中男欢女爱的场面千呼万唤始出来,连城自动提出:“恐事不谐,重负君矣。请先以魂报也。”两个人,不,两个鬼,“极尽欢恋,因徘徊不敢遽出,寄厢中者三日。”

两位恋人世间相爱,一个为爱情而死,另一个相从地下。他们是大活人时,是知己的精神型相爱。他们做了鬼,倒有了肉体关系,如此巧思,不知道蒲松龄怎么想出的。

“女以魂报”,与“生以肉报”一样巧妙、好玩、有趣。连城和乔生爱得缠缠绵绵,死而不休!

第三世:复活斗官府。

乔生、连城经过生死相从,在冥世完成了自主婚姻,这段感天动地知己恋已基本完成,蒲松龄却又写了二人复活后经受的挫折,既加重这段

恋情的感人力度,又把矛头指向鱼肉人民的官府。

连城复活后向父亲申明:“儿已委身乔郎,更无归理。如有变动,但仍一死!”

史孝廉默认了女儿和乔生婚事。不识趣的王化成却“具词申理”。根本不懂怜香惜玉的盐商之子顾生得用金钱运作官府。官府受贿,把连城判给王化成。虚伪的夫权靠官府撑腰,再次棒打鸳鸯,连城以死抗争,绝食、悬梁,王化成不得不将连城送回史家。史孝廉立即把女儿抬到乔家。

一场轰轰烈烈的知己恋、生死恋、三世情,终于尘埃落定。

以封建家长、官府为一边,以真心相爱的青年男女为一边,短兵相接,白热化相拼,几番风雨,两历生死,在金钱不能诱、威武不能屈、生死不能阻的恋人面前,父母之命为之让步、凶悍夫权为之却步、强大官府为之止步。《连城》弹奏出一曲顽石为之点头的“知己之恋”颂歌。

有学者以《红楼梦》宝黛爱情为“知己之爱”始作俑者,其实在曹雪芹出生那年驾鹤西去的蒲松龄,已借《连城》将“知己之恋”写得如泣如诉,如诗如画,警幻仙子所说的不同于皮肉淫淫的“意淫”也在《连城》中初露端倪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)

湘军主帅曾国藩一生成就偌大功业,可谓遍历苦楚、倍尝艰辛,他的口头禅是“打脱牙齿和血吞”。幸运儿怎会常说这句话?他分明是个苦命娃。仔细琢磨,曾国藩的口头禅真不算夸张,只是陈述一个事实。

禅宗初祖达摩法师从印度来汉地弘法,连梁武帝那样的佛门铁粉也居然患上了“雪盲症”,认不得活菩萨。有一次,神光法师集众讲经,直讲得天花乱坠,达摩听了,不以为然。他向神光提问:“法师,你在这里做什么?”神光回答:“我在这里讲经。”达摩又追问:“你讲经做什么?”神光回答:“我讲经教人了生断死。”达摩继续逼问:“生死如何了断?你讲的经,白的是纸,黑的是字,你用什么教人了生断死?”神光被达摩诘问得理屈词穷,当众出糗,因此勃然

【读史札记】

打脱牙齿和血吞

□王开林

大怒,一边厉骂达摩欺师谤法,一边猛挥念珠,痛打其脸颊。达摩武功高强,但对于这突如其来偷袭也躲闪不及,两颗牙齿应声脱臼。有些说法稀奇古怪,令人将信将疑,比如“圣人的牙齿若被打掉,吐在哪里,哪里就会大旱三年”。达摩以慈悲为怀,他心想:“三年不下雨,那会饿死多少人?我来汉地是度众生的,不是杀众生的。”于是他和着满嘴的血水将两颗牙齿吞咽下去,默不作声,快步流星地离开了神光的道场。

这段禅宗公案确实是一道开胃菜。如今,学术论争演变为全武行,以至于斯文扫地,并不算什么逗趣的新闻,然而搁在一千五百多年前,神光法师输不起,他的出格表演难免遭人诟病。好玩的是,故事的重点并不在此,而在于达摩“打脱牙齿和血吞”,体现出信念的力量。达摩既是慈悲的,也是智慧的;既是坚忍的,也是宽容的。

在更久远的古代,还有一个打掉牙齿、打不掉信念的故事,我也很喜欢。

战国时期,大策士张仪学成下山,将楚国当成自己立功成名的首站。开头不错,楚国丞相认定张仪是个人才,经常请他到相府喝酒议事。然而祸从天降,楚国丞相丢失了玉璧,张仪洗脱不了嫌疑,那些势利眼的有罪推断粗暴而简单:

“在赴宴的宾客中,就数张仪的家境最贫苦,此人品行不端,不是他干的,还能是谁干的?”

不由分说,众口咬定张仪偷窃了楚国丞相的玉璧,摔住这位倒霉蛋,一顿暴揍,直揍得张仪七窍冒青烟,满地寻白牙。相府家丁仔细搜遍张仪的每一道衣褶,也不见玉璧的踪影,只好放人。

张仪带着浑身伤痛,回到家里,却遭到前所未有的冷遇。老婆懒得同情他的冤屈,还要雪上加霜,嘲弄道:

“哟!今天你不是去相府喝酒吗?怎么喝出满嘴血泡泡来了?要是不读那些劳什子书,到处油嘴滑舌,谁会把你当贼抓?”

张仪比师兄苏秦更有喜乐相,更具幽默感,抗击打能力也更强。他无意计较老婆没心没肺的挖苦,只是张开嘴巴,用手指头朝里面指了指,然后瞪一眼那位头发长见识短的婆娘,提一个再浅显不过的问题:

“你睁大眼睛,要看清楚啦,我的舌头还在不在?”

“那根三寸长的烂舌头倒是完好无损!”原本板着脸的黄脸婆居然被逗乐了。

“那就万事大吉,我的本钱毫无损失!”张仪具有充足的底气,眼下就算是流年不利,也无碍明日鸿运当头。

看完这两个古老的故事,你就会明白,“打脱牙齿和血吞”真还不是湘军大帅曾国藩名下的专利。在两千多年前,张仪曾干得挺欢。在一千多年前,达摩曾干得挺好。这比“打完左脸给右脸”更有血性。

一个人,不怕别人打掉你的牙齿,就怕别人打掉你的信念。信念若在,一切俱在。这话不难理解。毕竟,掉了牙齿,还可以再镶;掉了链子,还可以重装;若掉了信念,就如同掉了魂魄,别说自己站不稳、走不动,就是别人伸出手来挽上一把,也扶不起啊!

(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)

【历史尘烟】

□散木

茅盾的女婿——烈士萧逸

在茅公的晚年,经历了许许多多风雨,不时袭上他心头的是对这一对早死的爱女和爱婿的无尽的怀念。



茅盾与夫人1956年8月在青岛

韦韬),当时茅公也很放心地将子女留在延安,于是拜别了众人,愉快地随董必武等开赴重庆去了。没有想到的是,这一走,女儿沈霞却与她的父母从此天人相隔。

沈霞在延安学习时,与萧逸相恋并结合,后来为了不拖累自己和丈夫的学习和战斗,怀孕以后决定去进行人工流产,不料手术过程中发生了医疗事故,沈霞死在手术台上。其时,也正是茅公夫妇在后方思念延安的一对子女之时,彼时茅公还作诗寄托思念之情:

双双小儿女,

疾书诉契阔。

梦晤如平生,

欢笑复鸣咽。

感此倍怆神,

但祝健且硕。

中夜起徘徊,

寒蛩何凄切。

沈霞的爱人萧逸,原名徐德纯,江苏南通人,来延安之前是上海一家口琴厂的工人,后来在其兄长的影响下投身革命,千里迢迢地奔赴延安。萧逸先后在“鲁艺”和“抗大”学习,曾听过茅盾在“鲁艺”的演讲,后来成了新华社的战地记者。

数年之后,解放战争打

响,萧逸随军开赴华北,及至北平和平解放,他入城以后拜见了岳父和岳母,并表示战争结束后他愿意在岳父教导下从事写作。茅公很喜欢这个上门女婿,岂料不久萧逸随军辗转于太原战役前线,他在战场上开展对敌政治工作,一次他在战壕前对敌喊话宣传,被对面射来的冷枪击中。萧逸牺牲时只有34岁。

太原解放后,部队派人把烈士的遗物交给了茅盾。茅公痛失爱女之后又失爱婿,十分悲痛,他慨叹女儿是一粒“未出膛的子弹”“出师未捷身先死”之憾)死于庸医之手,女婿又猝死于敌人的诈降之计,不由两行老泪落了下来。

想到新中国解放在即,萧逸却再也见不到他的祖国、再也不能从事他所热爱的文学创作,茅公为此伤感不已。从此,在茅公(后来他是新中国的文化部长)的寓所内,客厅墙上总悬挂着一个青年的照片,他就是萧逸。

在茅公的晚年,经历了许许多多风雨,不时袭上他心头的是对这一对早死的爱女和爱婿的无尽的怀念。“文革”中,茅公也遭受到了冲击,当时甚至家里的保姆也宣布“造反”,而造反者们更手指着他宅中墙上的萧逸的照片说:“他是国军!你为什么挂他的照片?”

茅公不容有人侮辱烈士,他大声地回答说:“他是新华社的战地记者,他是革命烈士!”

(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、浙江大学教授)